

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农村经济与基层社会^{*}

——以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攸县为个案

陈益元

(湖南工业大学 思政部,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公社体制的解体,标志着人民公社时期全能式控制模式的结束。湖南省的个案显示,公社体制解体后,攸县农村的经济格局、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农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悖论的是,农村社会也同时出现了双层经营体制偏颇、农业发展后劲衰竭、农村社会管理失序等不足和缺点。

[关键词]公社体制 解体 经济变迁 基层社会 攸县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4-0021-06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的推行,标志着在当代中国维持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走向了瓦解。从此,中国农村社会由公社体制时代步入公社后体制时代^①。这种体制转换对中国农村社会造成的深刻、长远影响,可以从多个层面、多种领域和多重视角来进行探讨和分析^②。

从现有研究看,学界研究和探讨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梳理、分析和概括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的新变化、新景象和新格局。这些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和整体的抽象、概括^③。二是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揭示和总结公社体制瓦解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和困局^④。它关注的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区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以及微观乡村视角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和难题。上述两种研究视角,主要是从国家、乡村两个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和探讨的。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县政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最基本的行政管辖单位。因此,以县域为研究对象的中观视角,既可以上溯国家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又可以下追乡村基层的落实和运作图景。基于此,本文以中部地区湖南省攸县为研究个案,考察、揭示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体制转换对农村基层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收稿日期】2012-10-02

一、公社体制解体后的农村经济

公社体制的解体,改变了公社时期原有政社合一的全能式控制方式。从此,中国农村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景象,与之相伴随,体制转换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公社体制的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攸县农业经济的格局,农业生产出现了四个明显的转向。

*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BA11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1A0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红宇:《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发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张乐天:《公社制度终结后的农村政治与经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谢志岩:《公社后体制下的乡村政治:变迁与重建》,《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等等。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6年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4年版。何勤华:《公产与私产之间——公社解体之际的村队成员权及其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古学斌:《否定政府,重建村庄:中国大陆梅县客家地区自发社区组织的形成》,《中国乡村研究》2010年第7辑。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何清涟:《农村基层地方恶势力的兴起》,《二十一世纪》(香港)1996年第3期,等等。

经营目的上,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经济的束缚,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全县涌现出各种专业户、重点户 24300 户,占总农户的 16.2%,比 1982 年的 2.74% 上升了 13.6%。在他们带动下,出现了一些以一业为主,定向生产的区域化专业生产基地。全县贡献国家粮食 31849 万斤,占粮食生产的 36.3%。

经营范围上,突破了单一经营的状态,开始向多种经营、农工商综合发展转化。经营范围从田土伸展到水面、空间,从种养业伸展到加工、运输,从生产领域伸展到流通领域,打破了单一经营的格局,开始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1983 年的粮食收入比重比大包干前的 1981 年下降了 2.78%,而多种经营收入的比例则由 1981 年的 41.6% 上升到 44.38%。

经营方向上,突破了简单再生产的局面,向开发性生产转化。农民开始把积蓄起来的财力、物力和剩余劳力投向荒山、荒坡、荒水,走开发致富的道路。

经营方法上,突破了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开始向集约化经营转化。全县杂交水稻面积占晚稻面积的 84.94%,产量却占 89.97%^[1]。

其次,农民商品经济意识、农村产业比例和农民家庭创富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农民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不少人转变“温饱”观念,树立大富观念;打破“守土”观念,坚定开放观念;破除平均观念,增强竞争意识;抛弃“贱商”观念,树立兴商观念;克服“老粗”观念,加强知识观念,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县域商品经济的发展。

农村第二、三产业比重得到提高。不少人从农内产业向农外产业转移,生产领域不断拓宽。1987 年攸县有 4 万多劳力输出,占农村剩余劳力的 40% 以上,全县劳务输出总收入达 4925 万元,占全县农民纯收入总额的 13%^[4]。地处攸县边陲,自然资源贫乏的渌田乡,该年劳务收入达 584 万元,占全乡社会总产值的 24%,仅此一项人均增收 157 元,摘掉了贫困帽^[5] (pp.664-665)。1988 年全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收入达 26423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8.4%。1985 至 1988 年 4 年中,农民在工、商、运(输)、建(筑)、服(务)“五业”中累计创总产值 78088 万元,年人平 308.6 元,比 1984 年增加 100.3 元,比 1981 年增加 193.7 元。

家庭致富步伐继续加快。1988 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 527 元,比 1984 年增长 55%,比 1981 年增长 263.4%。在这 4 年中,手表、单车、电风扇、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商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6],不少农户建成了新居。

再次,农民的收入、粮食占有和生活物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

1985 年全县农村总收入 33805 万元,国家税收占 2.14%,集体提留占 1.03%,各项费用占 21.42%,社员实际所得占 75.41%,比 1977 年增长 3.42 倍。据 1682 户专业户的调查,1985 年总收入万元以上的达 154 户,纯收入万元以上的有 40 户。社员分配的口粮,1982 年人均 341.5 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集体的粮食后,农民手中占有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储备),1983 年人均 453 公斤,1985 年人均 480 公斤。主要生活物资的消费,人均口粮 354.9 公斤,食油 4 公斤,猪肉 16 公斤,棉布 5.23 公尺。一些中高档生活消费品有了较多的增加。1985 年呢绒绸缎、毛绳、皮鞋的消费量分别比 1977 年增长 1.76 倍、5.09 倍和 3.45 倍。手表、自行车已在农村普及,电视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也成了农村的消费品。1979 到 1984 年,49491 户农民新住房为 633 万平方米,占 1984 年总农户的 34.6%。根据典型调查,1985 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 26.37 平方米^[7]。在消费支出吃、穿、住、用四个方面,1985 年与 1982 年相比,吃、穿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下降了,而住和用的比例却上升了(见表 1)。

与上述三个方面变化形成反差和对照的是,受宏观政策的偏差、工农业关系的偏颇,以及双层经营体制“统”“分”关系的失衡等因素的影响,攸县农村社会同时出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困难、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和农业发展后劲乏力的弊端。

商品生产发展上,农民困难很多。化肥供应方面,就出现了供需矛盾、政策不一的情况。据调查,1984 年 1 月到 3 月,攸县化肥销售总量比 1983 年同期减少 46.58%,化肥库存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8.9%。1983 年全省实行统一价,1984 年却是一县一价,酃县与株洲县相比,每吨磷肥差 33 元,农民有意见,不愿意要,说:“肥料涨价,粮食降价,我们怎么富起来?”有些农户“心里想富,脚下无路”,

表 1 农民家庭主要生活消费支出典型调查

项目		1982 年	1985 年	
户数		50	100	
人口		244	469	
主要 消费 支出 (单位: 元)	合计	人均金额	255.90	362.56
		占纯收入%	79.32	77.64
	吃	人均金额	177.00	234.20
		占消费总支出%	69.17	64.60
	穿	人均金额	35.30	39.68
		占消费总支出%	13.79	10.94
	住	人均金额	30.40	51.62
		占消费总支出%	11.88	14.24
	用	人均金额	18.20	37.06
		占消费总支出%	5.16	10.22
人均消费粮食(斤)		716	709.8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24.9	26.37	

资料来源:攸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攸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65 页。

“心中急人,致富无门”。攸县里旺村农民反映发展商品生产有“四难”:一是技术力量缺,能人和技术骨干少,艺不高胆很小。二是资金无来源。全村 1984 年有 6 万元贷款指标,村信用社资金已调去 1.5 万元给银行保重点建设,每亩田只 10 多元钱,稻谷生产费用都难以满足,哪有贷款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部门帮助少。本村没有特色的产品,部门来的人不多,群众希望部门不搞“马路”政策,不只抓“重点”,要帮助不闻名的地区提供商品信息,引进良种良畜,搞好技术培训,增加饲料供应,及时加强指导。四是管理费、税收多。如生猪,每头税收 9 元、加防疫费、兽医费等,共 11.50 元^⑧。

农民种粮积极性上,弃田、惧耕现象比较普遍。从原来多种早、晚二季稻到多种一季稻;从原来的盼种田、多种田到近年的怕种田、不愿种田;从原来用粮食完成国家农田任务到近年出现买粮交国家任务等等,不一而足。

据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现行的粮食合同订购制度,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实行合同订购后,售粮农民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以 1983 年为例,粮食统购议售每百斤平均价为 17.19 元,1985 年开始的合同订购到“三七”每百斤均价为 15.59 元。就是说,粮农每交售 100 斤粮食,实际减少收入 1.60 元。合同订购任务越大,农民吃亏越多。

(二)粮食的比较效益低,稳不住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除粮食以外

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农产品内部比价不合理问题更加突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劣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据攸县皇图岭镇提供的有关种粮食、西瓜、辣椒的收入情况看,粮食亩平纯收入是 131.3 元,每个工值 6.54 元;西瓜亩平纯收入 430 元,每个工值 14 元;辣椒亩平纯收入高达 794.66 元,每个工值 10.55 元。粮食价格上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势必直接影响到农民种商品粮的积极性。不少农民在粮食生产上的态度是:不愿不种,但不愿多种、不愿花本钱种、不愿下工夫种。愿把主要精力投向经济效益高的其他经营项目上去。

(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暴涨,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宏观上已经失控,涨到了农民难以承受的地步,少则涨价百分之几十,多则涨价三四倍。以尿素为例,1983 年每百斤平价是 22.5 元,1988 年是 27.5 元,上涨 22.2%。问题是平价尿素很少供应,农民只得以每百斤 70~100 元的高价到黑市上去购买尿素。县计委、物委等部门匡算: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全县农民 1987 年比 1986 年至少要增加支出 205 万元。县农调队 100 户“家计”调查:1987 年一二季度农业生产支出比 1986 年同期增加 16.3%,占农民因某些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增收部分的 85%以上。粮农怨声载道,埋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议价肥料、农药我不买,合同订购粮食我不卖。”无可奈何走极端,表明农民对这种政策的不满和抵制。

这样,粮食产量急剧下降。1986 年生产实际只完成七五计划指标的 97%,比 1985 年减产

2.36%。向国家贡献总量只完成年度规划的59.6%,商品率只有21.4%。

农业发展上,掠夺性经营、农田水利设施失修、农业技术倒退等,都造成了后劲乏力的不利局面。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和缺位,造成很多农民重用地轻养地,重化肥轻有机肥,重产出轻投入。长期掠夺性的经营,使得土壤肥力呈下降趋势。据县土肥站对全县6大主要土种的测定,1987年土壤有机质比1981年下降了0.55%,每年递减0.08%,全氮、全磷、全钾含量分别减少0.03%、0.06%和0.08%,速效氮、磷、钾依次减少27.7、7.83、7.42pm。1984年地力产量占常规产量67.1%,1986年仅占64.6%,地力产量1986年比1984年下降2.7%。在水利设施上,由于各级投资和农民投工减少,特别是管理不善,不但新的水利工程少建,原有的水利工程也得不到应有的整修和维护,农村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排灌机械陈旧。20世纪70年代初,攸县水利建设就已具规模,农田有效灌溉和旱涝保收面积分别达到了81.12%和78.6%。到1987年,据县水利局统计,全县20座小(一)型、175座小(二)型水库中,有19座存在隐患,15座要控制运行,11座严重淤积。9大县管灌区282条渠系,有87条泥沙淤积、杂草丛生,影响5万亩农田灌溉。844处电排中,有124处年久失修开不动,减少灌溉面积1.4万亩。在农业技术上,农业机械增加,耕作手段倒退。近年增加的农业机械多数不务正业,主要是用于跑运输,很少下田干活。1986年稻田机械面积由1980年43万亩下降到27万亩,减少37%。30个农机管理站关闭了10个,近300个村级农机队“网破、人散”^[9]。农业推广体系不健全,1987年攸县30个乡镇农技站有10个已瓦解,农民技术员由63名减至17名,平均每个乡站不到1人^[10]。在丫江桥、贾山、大桥等乡,人拉犁,锄挖田,取代了耕牛、农机翻耕。这种社会向前发展,农业生产却回归原始耕作状态的景象,呈现出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衰竭状态。

二、双层经营体制下基层干群的思想与行为

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基层推行的是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确立,目的在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又兼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但是,到底如何认识、处理“统”与“分”的关系,却难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精准的标度。

责任制刚推行时,攸县实行按人头包田,许多乡镇有“分”无“统”,多年的集体积累被分光,村组经济被架空。这样,村组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农业的投入受到制约,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开展。连片稻田分成小块,责任田土变更频繁,承包者谁也不愿向责任田使劲,怕为别人做“嫁衣裳”,集体组织对生产的组织和协调困难重重。

基层干部服务意识欠缺,干群关系不和谐。在很多乡村,许多干部索多予少,服务倒退,冷淡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皇图岭乡原来广播入户率达78.4%,而现有的4738只喇叭只有47%发声。高和村11个村民组227户,有154只广播,现仅有7只发声,分布在5个村民小组,村里的扩音器借走了,配电板被偷走了,也无人问津^[11]。有不少单位和部门吃的是农民种的平价粮,卖给农民的却是高价肥、高价农药,把生产成本增加的费用几乎都转嫁给了农民。有的地方的干部,平时不到农村帮助农民搞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而到合同订购粮入库时,则成群结队下乡催粮,农民反感很大。有的农民说:“现在的干部只知要粮(订购粮)、要钱(摊派款)、要命(计划生育)”。农民负担很重,心里十分矛盾,既盼干部下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又怕干部下乡(难招待)^[10]。

再者,许多基层干部直面新形势时,思想错位、行为缺位。

包干到户后,有的干部认为,包干到了户,各户管各户,千斤担子众人挑,我们可以直直腰。群众认为“包了责任田,不再是社员”,“只要能搞富,什么都不顾”^[12]。部分党员觉得村里的事不好管,也不需要管,顾全自己就差不多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了,事业心减弱了,村组工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钟佳桥乡平江村,公路无法通车,十多条木板桥被偷走,乱砍滥伐时有发生,五保户、困难户无人问津,开个党员会,也是张三来,李四不来^[13]。菜花坪乡苏塘村,出现了“山上冒得(方言,没有)树,渠中水断流,路上尽是坑,广播不叫灯不明”^[12]

的荒凉、无序状态。

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上,很多村干部反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们工作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难处。

(一)由集体统筹统留转为分户上交,公事难办。如攸县莲塘坳乡村企业收入很少,民办教师工资、烈军属补贴、干部报酬、民工建勤、水利建设、计划生育等项开支都靠农户上交。1984年12月,乡政府派干部与村干部配合,用了20天时间来收上交款,仍有11个村上交款未收齐。铜锣村1983年的上交款没收一分,村干部挑着箩筐逐户收谷,辛辛苦苦收了12000斤,送到粮站,岂料全部被当作该村的公粮扣下,“水中捞月一场空”。春塘、春风等6个村的沿河防洪堤被洪水冲毁三年了,一遇暴雨,洪水就淹没农田,河岸两边的耕地也在逐年减少,可干部只能“空着急”。1985年取消统派购后,村干部更是担心上交难收。春联支部书记刘××当了20年干部,他说:“上交是难收到了,今年还无偿为人民服务一年,报答党的养育之恩,明年我不干了。”^[14]上交提留收取,更是干群关系紧张的引线。这当中,村干部补贴的收取,是群众最反感、村干部最烦恼、乡干部最棘手的事情。上云桥乡宋家洲村党支书说:“千改革,万改革,上交提留不改革,乡村干部日日夜夜都是‘革’(方言,愁的意思)。”菜花坪乡菜花坪村党支书感到上交无可奈何,写了一副对联:“好事坏事不管事,自然无事,守摊保摊莫乱摊,等待交摊。”坪阳庙乡冲台村党支书说:“现在是群众捏了刀把,干部捏着刀口。县里办学习班时我浑身来劲(方言,精神抖擞)腰杆硬,回来一收上交碰钉子,硬腰杆又变成了软面条。”坪阳庙乡一个干部说:“今年三次收上交,我们挨了三次骂,现在乡干部权没过去生产队长,顶不了旧社会的保甲长。”^[15]这些个案虽不具普遍意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基层干部在新形势下的困境和面临的难题。

(二)群众实际问题、具体问题很多,村干部没有能力解决,难以赢得人心。盘龙村党支部书记说:“以前搞集体,村干部有人权、财权、物权,社员有困难,能及时解决。现在‘三权’旁落,为病人写张条子、到信用社借几块钱治病也没有用了。”1985年全乡有30%的农户少粮,过去干部可以通

过调剂生产队储备粮解决,现在只能指望国家。农民说村干部是“一遮不得雨,二避不得风,可有可无”。相反,计划生育、乱砍滥伐等得罪人的事,村干部又不得不管。双沿村党支部书记单××任职5年,先后处理48户纠纷,牵涉当事人120人,其中有8户与他“水火不相容”。他说:“我现在骑虎难下,当下去,得罪的人会越来越多;不当,更难站稳脚。”有个农民经常偷树,又生二胎,书记单××三次上门处理,罚款380元,今年这个农民的妻子怀了第四胎,单书记怕上门处理了。

(三)农村政策放宽后,群众思想复杂,工作难做。沿仓村有个农民要把房子建在垅中的责任田里,由于家有手扶拖拉机,他还要修条机耕路。支部书记前去制止,他说不建在垅里可以,你得安排地基。按照规划安排地基,其他农户不肯调整责任田。想开群众会解决这个问题,东家出门做生意,西家外出打扑克,会开不成。村干部无可奈何,乡干部来也没有法子。这户农民还是把房子建在垅中间。

(四)村工作付劳多,报酬少,村干部家庭富起来难。村里的工作,集中在两三个主干身上。尤其是书记,什么事都要管。上级不管来了什么人,首先是找书记,连妇女扫盲课本也送到书记家,而报酬只有340元左右,莲塘坳乡有5个村的主干至今还没有拿到去年的报酬。全乡25个村,73个主干,只有2户比较富裕。1户有电视机,还是儿子结婚女方打发(方言,女方送来)来的。一些村干部说:“我们上山冒(方言,没有的意思)做得和尚,下山冒讨得婆娘(方言,媳妇的意思)。”

(五)上受政府、部门逼,下挨爱人、群众骂,处境难过。村干部普遍反映,他们“一个手指伸在政府、部门口里,一个伸在群众口里,两头吃紧”。盘龙村1983年被洪水冲坏一座桥,影响南北交通和学生上学,村里经济困难,一时难修复,群众遇见村干部就骂,乡里也批评村里抗灾不力。1984年下半年,村里集资1.5万元建桥,没有木材,经该乡乡长同意在自己的林场间伐160根杉树,全都用于建桥。县林业局驻乡林管站书面通知该村支部书记和村长,处罚300元,还说要不是办公益事业,还得追究刑事责任,村干部听了很不舒服。据调查,全乡21个主干不安心工作,占村主干总人数的29%^[14]。

农村基层干部反映出的这些难处,较为真实、具体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的失序、无序状态,以及基层干部行为上左右支绌的困难境地。这些情况说明,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户经济的回归,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但也造成基层干群思想上的迷茫和社区管理的离乱。因此,如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双层经营体制,既发挥集体组织的优势,又调动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还需要各地根据本地的实情,作长期、深入的探索,唯此,才能改变“统”“分”关系错位,集体和个体良性互动关系难以形成的被动局面。

三、结论

前面我们以公社体制解体后的20世纪80年代为时间段,实证考察了中部典型农业地区湖南省攸县的农村经济变迁,以及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基层干群思想和行为状况。公社体制转向后公社体制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新形势下国家权力如何介入、驾驭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2]。20世纪80年代攸县农村经济格局的转变,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从原因上分析,它有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等因素,但最为根本的,是公社体制转换后新的体制潜能释放的结果。从这一角度分析,公社体制解体后,“分”的潜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从农村较为长远的历史时段上看,如果“统”“分”关系处理不好,“统”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那么,基层干群的思想行为就会陷入一个混乱、无为的境地,集体组

织的作用发挥也会受到阻滞和限制。攸县农村社会秩序的失序、无序状态,农业社会公用事业的凋零,以及农业生产发展后进的衰竭,就较为鲜明地呈现出公社体制解体后农村深度、长远发展面临困境的另类面相。

【作者简介】陈益元,男,1966年生,湖南省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 [1]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12(2).
- [2]陈益元.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国农史,2006(2).
- [3]1983年工作情况报告(1983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119.
- [4]攸县劳务输出成效显著(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2.
- [5]攸县渌田乡把七千农民推向广阔的劳务市场(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373.
- [6]“黄土地”的欢欣与困惑——攸县农民家庭创富情况调查(上篇)(1991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476.
- [7]攸县志编撰委员会.攸县志[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 [8]农村信息(第138期)(1984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17.
- [9]攸县建设商品粮基地的难点与对策(1987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4.
- [10]一个亟待决策的重大问题——株洲市农业后进严重不足的调查报告(1988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73—2—85.
- [11]攸县当前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报告(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 [12]攸县农村党支部书记学习班简介材料之三(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 [13]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堡垒作用——记钟佳桥乡平江村党支部(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0.
- [14]村干部的苦衷——攸县莲塘坳乡调查(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9.
- [15]全县农村工作考核情况综合(1985年)[Z].攸县档案馆档案:4—2—1266.

Country Economy and Grass-Roots Society after Commune System's Disorganization Take Youxian in 1980s for Example

Abstract: The disorganization of commune system indicated the end of people commune which controlled by the mode of omnipotence. The case of Hunan province reveal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country economy, the direction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Youxian county were enhanced in evidence. The live and consume level of peasant were enhanced notability. Contrast to this, the backward and shortage were appeared simultaneity in country society. It i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double deck was biased, the backward of country development was crocked up, the management of country society was disordered.

Key Words: Commune System, Disorganization, Economy Transition, Grass-Roots Society, Youxian